

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

1960-1990年代

• 王建平

作為社會中間層的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會兩極中的緩衝作用，一直以來基本沒有引起太大的異議。早在亞里士多德那裏，中產階級就是社會兩極之間的平衡力量，是社會安定的因素^①。馬克思從工人運動與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也自然而然地認為，中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階級的存在，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②。二十世紀50年代，米爾斯(C. Wright Mills)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與政治作用的研究更認為，美國的中產階級是「一些身不由己的、隨波逐流的平衡力量」；因此，在政治鬥爭中，他們成為了「其他更有權力，更有聲勢的壓力集團的別動隊」，「他們在政治上也許很不穩定，但是卻沒有任何政治熱情」，「他們是歷史性變革的後衛」^③。米爾斯所描述的美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形象似乎已經成為定論，在此前後的幾十年間不僅在理論上沒有出現分歧，在實踐中也沒有遇過新的挑戰，直到東亞尤其是韓國的中產階級出現為止。由於韓國中產階級在國內政治舞台上發揮的作用日漸重要，有關中產階級政治角色與政治作用的問題重新獲得進一步的關注與思考。

50年代，米爾斯認為美國的中產階級是「一些身不由己的、隨波逐流的平衡力量」，「他們在政治上也許很不穩定，但是卻沒有任何政治熱情」，「是歷史性變革的後衛」。他的研究成果在此前後幾十年間不僅在理論上沒有出現分歧，在實踐中也沒有遭遇新的挑戰，直到東亞尤其是韓國的中產階級出現為止。

二十世紀60至90年代是韓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隨着社會轉型加劇，中產階級應運而生，並不斷壯大。在韓國特定的歷史傳統與社會背景中，韓國中產階級具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徵：第一、當代韓國的中產階級更多是以生活方式、地位等主觀標準而不是以財產、職業等傳統指標劃分的^④；第二、韓國中產階級很難像美國那樣，可以清楚地兩分為新中產階級與舊中產階級；第三、韓國中產階級的出現與發展，同韓國特定時期強力主導型的集權式「權威主義」國家、政府緊密相關，韓國中產階級是在向國家爭取自由、民主的互動博弈過程中形成與不斷發展的；第四、韓國中產階級主要是第一代，他們不僅由不同的部分組成，而且也是戰後社會流動現象的產物。同韓國的整個社會階級結構一樣，中產階級仍然處於演變與發展時期；第五，韓國中產階級雖然不僅指工薪

階層，但這群工薪階層卻缺乏美國甚至鄰國日本的工薪者 (salary man) 所具有的安全感與穩定性^⑥。由於韓國中產階級擁有上述這些特徵，使他們的政治參與多少有些出乎現有理論的預期，更加引人注目。

一 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

事實上，在二十世紀60至90年代的三十多年裏，韓國中產階級以其特有的熱情參與了不同時期的政治運動。不少證據表明，在過去三十年韓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中，中產階級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1960年4月，包括白領工人和小企業主在內的中產階級積極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直接導致李承晚的獨裁統治倒台。在1971年的總統選舉中，絕大多數的城市中產階級投票支持金大中，反對朴正熙違反憲法最大任期不得連續超過兩屆的規定而企圖繼續執政。不過，朴正熙仍然通過行政手段操縱公民投票修改了憲法，參與第三次選舉。儘管如此，朴正熙卻只獲得全部選票的51.2%，金大中獲43.6%。在以微弱優勢險勝金大中而逃過此劫後，朴正熙決定廢除直接總統選舉制度。1985年的總統大選中，中產階級反對集權統治的抗議活動表現得更為明顯。這次選舉中，由被壓抑幾年後剛剛恢復人權的政治老對手組成的反對黨——新民黨，在城市中產階級主要居住地區大獲全勝，給執政黨帶來不少麻煩。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最富戲劇性的事件發生在1987年6月，大量白領工人參加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要求修改憲法進行直接的總統選舉。這是中產階級參加的最大型反政府街頭群眾遊行示威活動，其規模和激烈程度，都要比他們曾經參加過的1960年學生遊行運動大得多。中產階級的廣泛參與改變了全斗煥統治集團的態度，也影響了美國政府對全斗煥的統治能否繼續存在下去的看法。執政黨因而感受到深重的政治危機，並在民眾的政治壓力下讓步^⑦。

這些證據清楚地表明：韓國中產階級有強烈的民主願望，並在幾個關鍵時刻對政治變革起到催化作用。其一，韓國中產階級有力的政治參與，推進了韓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韓國保持完整的儒教倫理道德，「一方面可說是美風良俗，但另一方面卻是在政治上產生集權『權威主義』不良後果的根源」，成為「滋生權威主義的溫牀」^⑧，這使得從韓國獨立伊始李承晚執政一直到全斗煥在位期間，一直奉行集權式的「權威主義」，共和只是徒具虛名。但隨着韓國經濟現代化的步步深入，中產階級力量不斷壯大，政治民主化已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盧泰愚上台及其1987年發表歷史性的「六·二九」民主化宣言，標誌着軍人政治的終結；第六共和國的金泳三創立透明政治，重建親民形象，使韓國的政治體制發生重大改變，實現了從集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飛躍；1998年金大中當選總統，這種朝野之間的更替則使民主化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在短短幾十年內，韓國政治文化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相對獨立於國家政權的經濟—社會力量——市民社會逐漸形成；合法性意識從權力運用到權力認同；集權主導型體制向民主主導型體制轉變^⑨。在二十世紀90年代末，「韓國中產階級比例已佔人口的六

從獨立伊始，韓國一直奉行「權威主義」，共和只是徒具虛名。但隨着經濟現代化深入，中產階級力量不斷壯大，政治民主化已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盧泰愚上台標誌着軍人政治的終結；金泳三創立透明政治，實現了從集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飛躍；1998年金大中當選總統，使民主化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成左右，成為社會變革運動的主要力量」^⑨。其二，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促進了韓國市民社會的形成。中產階級隊伍不斷壯大，使他們與工人階級成為市民社會的兩大力量^⑩。而從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進程看，中產階級已經走上政治舞台，進而從根本上排除獨裁體制的社會基礎，以中產階級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市民社會在其形成與發展的同時，也對傳統儒教的社會、政治觀念提出挑戰，不斷衝擊韓國強國家與弱市民社會的傳統。

二 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取向

韓國中產階級對政治現狀十分不滿。他們不滿現有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希望現行的權力體系有顯著的變化。他們自認為改革主義者，喜歡不斷的變遷，對韓國社會發展目標有着明確想法。他們更多地表現出激進而不是保守的政治傾向。相關的幾個調查表明，他們強烈反對集權的政治體制，不滿遲滯的民主化進程以及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他們對韓國經濟發展的道路不滿，對於社會發展中的利益再分配也頗有微詞。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取向可從一些相關的調查得到更為詳盡的說明^⑪：

1987年，韓國中產階級認為經濟上的不平等是最嚴重的問題之一。2/3的受訪者同意「政府應該停止對大企業的優惠政策」，支持「那些擁有大量財富的人必須把他們的資產還給社會」的說法。由於中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受惠者，這種態度確實讓人始料不及。他們同樣對學生反對集權統治和知識份子的持不同政見運動表示強烈支持。

例如，1987年一個由政府進行的調查表明，中產階級受訪者認為經濟上的不平等是韓國三個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其餘兩個是集權的政治結構和政治領導人的腐敗^⑫。即使改進人權和收入分配的措施會引致經濟減速，仍有4/5的受訪者表示支持。此外，受訪者對富人和掌權者抱有強烈敵意，多於2/3的受訪者同意「政府應該停止對大企業的優惠政策」的說法。讓人吃驚的是，絕大多數受訪者(88%)支持「那些擁有大量財富的人必須把他們的資產還給社會」的說法。由於這些中產階級受訪者一度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受惠者，這種態度確實有些讓人始料不及。更有甚者，這些中產階級受訪者表達了對貧苦農民、工廠工人和貧民區居民的強烈同情，支持他們的抗議活動。他們同樣對學生反對集權統治的遊行和知識份子的持不同政見運動表示強烈支持。

1983年的另一個調查發現，中間階層有一種親近勞動者的強烈取向。實際上，這些發現說明中產階級受訪者比工人階級受訪者對政府壓制勞工組織的政策更加持批評態度。大約2/3的中產階級受訪者把勞工衝突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僱主的貪婪和政府對工人的強硬壓制，而不是工人的無理要求。

1987年，韓國出現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動，事件帶來政治自由化的覺醒，引發了前所未有的遍布全國的勞工不安狀況。事件發生後不久，一個在漢城進行的調查發現，包括新中產階級和舊中產階級在內的受訪者，對勞工衝突和學生遊行有較高的容忍度，當中新中產階級比舊中產階級更支持這些活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現在的勞資關係對工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必須加以改變，工人的權利應該得到尊重。超過四成人贊成成立勞動黨，這在保守的韓國人當中一直被視為禁忌。

這個調查還發現中產階級對韓國的機會分布持積極的觀點。大多數中產階級受訪者相信在韓國社會中，只要有能力、肯刻苦工作就能夠取得成功。毫不

奇怪，老中產階級比新中產階級對社會流動機會表示出更大的信心。儘管這些中產階級受訪者對體制持批評態度，他們仍然認為政府在解決諸如貧困、住房、醫療和教育等主要社會問題時起着重要作用。另外，在社會變遷的態度上，他們無疑是改革主義者。調查樣本中的大多數人喜歡以漸進的方式而非激進的改革來解決主要社會問題。

這些調查在邏輯上會得出韓國中產階級是非常激進、在政治取向上趨於民主的結論。但韓國中產階級是不是政治和民主轉型實踐過程中的進步政治力量呢？這個問題目前還在爭論之中。在群體態度和實際行為之間可能會有很大分別，在中產階級身上就更為可疑。即使中產階級按一致性的進步方式行動，但在它的本質與天性上仍有問題出現：他們的進步取向同工人階級一樣嗎？他們眼中的民主社會與工人階級相同嗎？

這些問題在韓國政治分析家之中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主要分為兩種看法：一些分析家認為韓國中產階級已經具有期望韓國政治和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變化的強烈共識，因此，他們會成為民主改革的進步力量；另一些韓國政治分析家則認為，韓國中產階級基本上是保守的群體。他們相信中產階級所展現的進步態度是膚淺而不真實的，他們懷疑中產階級作為過去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受惠者，會否真正樂意放棄他們所獲得的東西。中產階級的進步行為只是表現在他們曾經受益的經濟體制保持穩定和強大的條件之下。如果中產階級被社會大變動所威脅，他們很快就會改弦更張，轉向秩序和穩定的一面^③。

中產階級能否被視為政治轉型中的進步和民主力量，這引起了韓國政治分析家和社會學家的高度重視。在韓國，中產階級作為一個正在興起的、有形的社會力量，在前所未有的政治轉型中被賦予「政治使命」，至於中產階級能否擔此重任，人們仍在拭目以待。

三 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保守抑或進步？

韓國中產階級的出現是一個具有政治和社會根源的晚近現象。事實上，單獨強調韓國中產階級的進步一面或保守一面，都不能正確界定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更為客觀或者全面的看法是承認韓國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兩面性，即他們可能是溫和的，也可能是激進的；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是進步的，而這種政治角色的不確定性，要根據政治衝突的原因、進程和具體的情形來確定。

就韓國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傾向而言，它自然而然地分為趨於溫和、保守和進步、激進兩支方向。新中產階級部分傾向於同情工人階級，而老中產階級表現出更為保守的傾向。即使新中產階級的態度也會在集權國家和激進工人之間游移不定。如果國家和政府過於專制和保守，壓制或者鎮壓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治運動，他們會如同在激進勞工運動中曾經表現的那樣，支持學生和工人反抗國家和政府權威；但是如果學生、工人過於激進以至破壞社會穩定，因而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的話，他們又會收回支持。因此，「要理解中產階級

韓國中產階級是不是政治和民主轉型過程中的進步政治力量？一些分析家認為韓國中產階級已經具有期望韓國政治和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變化的強烈共識，因此，他們會成為民主改革的進步力量；另一些分析家則認為他們基本上是保守的群體。如果他們被社會重大變動所威脅，很快就會改弦更張，轉向秩序和穩定的一面。

的政治行為，必須首先明確中產階級付諸行動和作出反應的時局和形勢」^④。分析中產階級要求政治自由的進步角色和處於不確定的政治轉型中的保守角色時，超越當下形勢局限的分析是很重要的。總體而言，韓國中產階級在政治上扮演「搖擺不定」或者「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角色，它是不穩定、不確定和情境性的。

韓國中產階級的這種特定的政治角色，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第一，二戰後美國控制了韓國南部，並在教育方面作大規模投資，同時大幅度改革學校課程。這可能對戰後韓國人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可以推測，韓國中產階級的自由、民主理念不能不受此影響，這可能觸發韓國中產階級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一面。第二，國家、政府是理解和預測韓國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關鍵變量，國家與市民社會關係緊張是提高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重要原因。在韓國，國家處於經濟和社會轉型的中心。在發展策略上，韓國的集權政府通過直接而強有力的國家干預，在塑造和重塑社會階級結構中扮演着愈來愈重要的角色，這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通過市場的「看不見的手」調節社會結構以促進社會流動有所分別，這就給不同階層通過影響政府決策尋求自身利益留下空間和可能，也造成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緊張。因此，國家與政府自然而然成為階級形成的動因和政治鬥爭的目標。事實上，韓國中產階級以往的政治參與行為也大多是針對和反抗國家權力、爭取民主與自由的運動。第三，韓國中產階級的激進運動主要源於兩方面：一個是朴正熙和全斗煥軍人政權的嚴酷的集權主義，另一個是固化的階級結構。這實際上已經成為中產階級社會流動中的障礙，形成一個影響他們尋求自身利益的社會空間。與政治精英互相勾結的大資本主義小群體和大量被壓迫的工人之間的不平等的公開化，以及缺乏道德公正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都強烈地影響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意識。第四，同公正、平等概念一樣，民主也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的特殊涵義也因不同群體在不同時間而有所分別，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行為因此也與他們對民主的理解有關。韓國中產階級的民主概念與工人階級有顯著差異。韓國中產階級的民主主要是與美國國會代議制模式有關的自由民主。他們主要關心政治民主而不是經濟民主，他們心目中的民主，主要成分包括結束軍政統治，實行直接、自由的選舉，保障言論自由和基本的人權等等。而韓國工人階級的民主概念牽涉到更多的物質經濟權力，包括保證組織代表團，進行可以免於嚴厲打擊報復的集體行為，廢除車間的殘暴管理和其他廣泛的政治權力。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韓國中產階級充當的進步力量只是特殊意義上的進步：通過給專制政權施加壓力以求政治自由化，通過提供社會基礎以求民主轉型的穩定過程。他們在政治轉型中的政治行為無論如何是「機會主義」的，他們支持那些市民、學生和工人，是因為他們希望得到更多的社會和物質利益。中產階級只是在工人階級不尋求經濟民主時才成為他們的同盟軍。第五，在劇烈的社會轉型中，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社會利益分配不公平和專制政府的貪污腐敗行為等社會問題日漸突出，不斷刺激着韓國中產階級本來就很敏感的神經。加之80年代，韓國經歷了隨經濟焦慮而產生的政治意識的高漲。這一切都構成了韓國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動因。最後，韓國儒教傳統和中產階級本身的地位焦慮

韓國中產階級主要關心政治民主而不是經濟民主，包括結束軍政統治，實行直接、自由的選舉。但他們在政治轉型中的政治行為是「機會主義」的，他們之所以支持市民、學生和工人，是希望得到更多的社會和物質利益。中產階級只是在工人階級不尋求經濟民主時才成為他們的同盟軍。

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韓國儒教傳統中的「尚文主義價值觀在反對軍事政權、確立文人政權方面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⑤。韓國社會高度重視地位，也使得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成為在特殊時期為獲取資源而追求地位的新途徑，從而使他們參與政治的動機，具有明顯的韓國色彩。也正是在此意義上，「理解韓國當代中產階級及其發展的關鍵是了解韓國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驅動力」^⑥。

四 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另一種模式：與米爾斯的對話

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取向與政治參與，與米爾斯所描述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舊中產階級都形成了鮮明對比。那麼，米爾斯所說的中產階級的政治特徵是否已經不適用於以韓國為典型的另一類中產階級？或者說，韓國中產階級政治上的作為是否已經完全超越了米爾斯的預測？這個問題仍然需要謹慎對待。其一，由於中產階級從一開始就是異質性群體，由利益、價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異的成分組成，而且他們在社會結構變遷中具有較大的社會流動性，因此中產階級有一種內在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並自然而然地表現在他們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動之中。正如米爾斯認為的那樣^⑦：

中產階級無論是整體還是其兩翼，都沒有甚麼共同的忠誠的象徵，也沒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各種各樣的人加入到已有的各大集團中去，以壓力為手段在政黨和國家內部進行競爭。各方的分歧還不至於嚴重到允許他們進行自己的政治鬥爭，更不用說鼓勵他們這樣做了。

在這一點上米爾斯是對的，美國中產階級表現出的政治上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同樣也在韓國中產階級——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身上表現出來。其二，米爾斯曾經斷言由於中產階級「既不團結也無機會，他們不可能成為政治性很強的獨立的集團或者形成獨立的政黨」，「新中產階級沒有任何可能形成、創立或領導任何政治運動」^⑧。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似乎也證明了這種講法。雖然韓國中產階級在某種情況下會表現得較為激進，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韓國有哪一次政治運動的首倡者是中產階級。雖然中產階級參與過多次政治行動，但至今為止他們仍沒有形成自己的政黨。如果在這種政治衝突頻繁的社會轉型時期，韓國中產階級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政黨，那麼未來的希望就更渺茫。其三，儘管韓國中產階級表現出進步與激進的一面，但這種進步與激進並不是沒有原則和底限的，他們往往在政治運動可能進一步升級並威脅社會穩定的關鍵時刻作出讓步和妥協。這一事實表明，他們的政治熱情是有限度的，他們沒有像馬克思所言的工人階級才具有的一往直前、破舊立新的勇氣，因而在本質上他們是保守的，中產階級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只能是「後革命時代」。所以韓國中產階級仍然是維持社會穩定不可或缺的力量；這一點，與自亞里士多德起就看重的，也為米爾斯所強調的中產階級的社會穩定作用並不矛盾。

儘管韓國中產階級表現出進步與激進的一面，但並非沒有原則和底限，他們往往在政治運動可能升級並威脅社會穩定的關鍵時刻作出讓步和妥協。他們的政治熱情是有限度的，因而在本質上是保守的。中產階級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只能是「後革命時代」。所以他們仍然是維持社會穩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然而，由於韓國中產階級畢竟具有政治參與和政治取向上進步和激進的一面，因而，他們仍然與米爾斯的預言有所出入，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韓國中產階級已經超越或者突破了米爾斯的斷言，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其一，中產階級激進、進步的政治取向，已經使他們成為韓國社會變遷與政治舞台上一支至關重要的生力軍。這一點就可以說明米爾斯認為中產階級「沒有任何政治熱情」，「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以及可能採取的戰略使他們成為歷史性變革的後衛，而不是變革的倡議者和主力軍」，這一論調至少在目前的韓國中產階級身上是不能完全成立的。儘管在關鍵時刻，韓國中產階級往往可能收回他們的熱情，儘管目前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熱情可能大多是由轉型時期的特殊時局和對專制政府的不滿所引發的被動的、有限的或者說是暫時的激情，但這也是米爾斯始料未及的。就此而言，本質保守的韓國中產階級在韓國民主化進程上無疑是有所作為的，這也是正確估價其他與韓國境況相似的後發展國家中產階級的政治作用時應該予以考慮的。

其二，在米爾斯眼中，中產階級的政治行為是完全缺乏自覺性、目的性、被動的盲目跟從行為，他認為「在政治鬥爭中，新老中產階級都成了其他更有權力、更有聲勢的壓力集團的別動隊」。「新中產階級的政治問題是，他們最可能跟在哪個集團的尾巴後面跑呢？答案是：看上去最有可能取勝的集團和運動。」^⑨這一點在韓國中產階級身上也不能成立。事實上，韓國中產階級參與政治的目的，始終是包括結束軍政統治、實行直接、自由的選舉、爭取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等等在內的政治民主，也就是說他們的政治參與是有目的、有選擇性的。同時韓國中產階級（如知識份子）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進行有效的政治動員，他們大力聲援工人和學生運動，力圖影響選舉，而不是「只會在他們選擇的對象贏定了之後才選擇」，這些都表明他們並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他們的政治行為是從專制政府手中謀取更大權利的博弈行為，而當他們發現可能會出現「零和博弈」的結果時，他們會審時度勢，及時全身而退，這也是一種理性選擇行為。而中產階級的主動參與，也使得他們不只是意識形態鬥爭中的「依賴變量」，同時也可作為一個對意識形態領域施加重要影響的「獨立變量」。

因此，與其說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取向與政治參與跟米爾斯所預測和斷言的以美國中產階級為代表的中產階級政治特徵形成對比，不如說韓國中產階級提供了中產階級的另外一種可能的表現形式。因為韓國中產階級與美國中產階級政治表現的差異，可更多地歸結於兩國發展道路、政治體制與社會轉型過程的不同；而韓美兩國中產階級的相似性，則是中產階級的構成及其在社會結構中所處地位的相同本質所決定的。可以說，韓國中產階級的產生與實踐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米爾斯原有關於中產階級的理論存在的缺陷與不足，因為米爾斯與傳統的關於中產階級的理論，實質上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產階級為立足點的。中產階級是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的產物，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中產階級無疑是在自發的、內生的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而以韓國為代表的中產階級則是在後發的、外來式的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韓美兩國中產階級的差別可能正是不同的現代化道路與社會轉型過程的反映。這樣，韓國

米爾斯認為中產階級「沒有任何政治熱情」，他們的政治行為是完全缺乏目的性的跟從行為。但韓國中產階級激進的政治取向已經使他們成為韓國社會變遷與政治舞台上一支生力軍。他們參與政治的目的始終是包括爭取言論自由和基本人權的政治民主。因此，韓國中產階級已經超越了米爾斯的斷言。

中產階級將完全有可能代表另外一種理想類型，另外一個極端上與美國對立的中產階級模式。而且，由於其特徵與表現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因而更值得研究與關注。

塞德曼 (Steven Seidman) 認為，由於美國新中產階級政治上的保守，米爾斯預想美國將轉向一種寂靜的集權主義。在美國的社會背景中，米爾斯的「《白領》(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更像是對美國的一個忠告：新中產階級正在使這個國家走上一條極權主義道路」^⑩。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韓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使韓國政治走向與之相反的民主化道路。韓國與美國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不同，實際上應該歸於中產階級所處發展階段的不同和所依賴的社會及政治背景的不同。這些不同都足以使我們在談論中產階級的特徵時需要更加謹慎一點，更加具體一些。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中產階級無疑是在自發的、內生的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以韓國為代表的中產階級則是在後發的、外來式的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兩國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不同，應該歸於中產階級所處發展階段的不同和所依賴的社會及政治背景的不同。

註釋

- ① 王岩：〈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正義觀研究〉，《政治學研究》，2003年第1期。
- ② 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頁34。
- ③⑩⑪⑫⑬ 米爾斯(C. Wright Mills)著，楊小東等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393-94；393；394；394。
- ④ Denise Potrzeba 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 ⑤ Ezra F.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⑥⑩⑫⑬ Hagen Ko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 in *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e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3), 63-64; 59-61; 59; 65-66.
- ⑦ 朱偉奇、王夏剛、楊銳：〈韓國現代化的詮釋和反思〉，載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編：《韓國研究論叢》，第九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279。
- ⑧ 吳從環：〈困境與出路：韓國模式變遷的政治分析〉，載註⑦《韓國研究論叢》，第六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76-77。
- ⑨ Su-Hoon Lee, "Transitional Politics of Korea, 1987-1992: Activation of Civil Society", *Pacific Affairs* 66, no. 3 (Autumn 1993): 354.
- ⑩ 崔志鷹：〈試析韓國市民社會的發展〉，《國際觀察》，2002年第4期，頁48-52。
- ⑬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Discovering East Asian Middle Classes: Form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Politics", in *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15.
- ⑮ 朴昌根：〈論韓國人的尚文主義價值觀對韓國社會現代化的影響〉，載註⑦《韓國研究論叢》，第九輯，頁203。
- ⑯ 註④Leet, 41。
- ⑰ 塞德曼(Steven Seidman)著，劉北成等譯：《有爭議的知識：後現代時代的社會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頁112。

王建平 陝西洛南人，1970年生，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